

**【锐眼看市】**

距离2010年的份额调整,时间上已经过去了14年之久,其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力量格局也远非以前,按照现有IMF份额公式,目前IMF成员国的代表性存在被高估或低估的情况,其中,代表性被低估的成员国占成员国总数的41%,主要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张锐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日前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的第49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时表示,IMF的份额占比调整对于基金组织治理、代表性和合法性都至关重要,各方应合作推动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尽快就新的份额公式达成共识,为实现份额占比调整奠定基础。据悉,连同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上的发言,潘行长已是不到1个月的时间两次重申上述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牵头创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中IMF和世界银行就是该体系的两大国际金融支柱。虽然在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但IMF却保存了下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IMF的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当成员国陷入国际收支不平衡时,便通过提供中短期贷款满足成员国的融资需求,改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同时IMF可以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各国加强政策设计和提高政策运营能力。为此,IMF创建了特别提款权(SDR)制度,SDR根据会员国认缴的份额组成资金池,成员国在遭遇贸易赤字时,可以将自己账户中的SDR部分或全部兑换成可自由使用的外汇,也可以将账户下的SDR转入一般资源账户,以用来偿债或支付贸易付款与特定贷款等,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

作为全球性与多边性的国际金融机构,IMF截至目前已有成员国190个,每个成员国都在该组织中有一个配额或者份额,份额以百分比计算,决定着成员国对IMF的贡献,同时反映出其在IMF中的投票权重以及获得紧急融资规模的大小,因此,

IMF在性质上就是一个以份额为基础的金融机构。在份额缴纳方式上,IMF要求会员国25%以黄金或可兑换成黄金的货币缴纳,其余则以本国货币缴纳,最终汇总后以SDR来计值,其中成员国的GDP在SDR占50%的权重,开放度占30%的权重,经济波动性占15%的权重,国际储备占5%的权重。作为占比最大的指标,GDP的60%是按市价计算,40%则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

全面地分析,虽然IMF的资金池中有一部分来自市场发债融资,同时近年来IMF也开发出一些新的融资工具,如半永久性的新借款安排和临时性的双边借款安排等,但不是融资额度有限,就是稳定性较差,同时所融资金也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这样,成员国的出资份额继续保持IMF主要资金来源的地位。当然,由于份额占比调整的滞后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IMF基于份额的可贷资金占比近年来不断下降,目前已降至总可贷资金的40%左右。显然,及时的份额调整直接关系到IMF资金池是否充实无忧,也左右着IMF的危机救助以及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实力与能力。

对于成员国而言,在IMF票权份额的分配由“基本票+份额票”组成,其中每个成员国可获250张基本票,份额票则对应着上述的SDR各项权重指标,而在投票机制上,采取“基本票+份额票”的表决权机制,其中最重大事务须85%有效多数通过,重大事务要求70%有效多数通过。按照规定,IMF至少每五年进行一次配额审查,并根据全球经济格局变化进行相应调整。这种制度安排的初始目的在于,倒逼成员国加快经济发展,提升经济的开放程度,维护货币价值的稳定,进而形成支撑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的强大合力。但回过头来看,由

于IMF中原始优势力量的影响,成员国份额的调整其实并没有按照约定时间进行,围绕着份额调整的国际呼声也连绵不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效性也反复遭到质疑与诟病,正是如此,在由份额与治理改革、监督改革、融资能力与融资方式改革以及特别提款权改革等IMF“一揽子”改革构成中,份额与治理改革被称为“IMF悬崖”。

资料显示,截至目前IMF仅在2006年与2010年进行了两轮份额改革,前一次改革中IMF在增资扩股的同时扩张了基本票权,且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了4.9%的投票权,使得后者票权比重升至39.5%;相比第一次调整,第二次的变革力度要大一些。此次改革后,有约6%的份额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中国份额占比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同时,巴西、俄罗斯、印度都上升到前十位。但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的份额结构调整是在两个发达的欧洲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份额实现的,美国的投票权依然稳定在16.8%,也就是说继续保持着超过15%的重大决策否决权。

作为每5年进行一次份额总检查的既定动作,去年底IMF理事会以92.86%的赞成票批准了增加份额的决议,根据决议,成员国将以50%等比例提高各自缴纳的份额,并在2024年年底之前完成,由此,IMF的总份额资源将达约9600亿美元,相当于提高至7157亿SDR。的确,除了自身的“粮仓”有所充盈外,过去两年中以美联储为首的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采取了强力度的货币紧缩政策,带动了全球利率的上升,随之而来的全球融资条件紧缩,又提高了融资成本,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全球

高通胀和高债务风险不断演化,给发展中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的金融稳定性带来严峻挑战。在这一背景下,IMF增资有助于满足成员国的融资需求,提升对全球经济及脆弱国家经济增长的支持能力。但值得强调的是,本次份额的变化只是表现为成员国的无差别增资,尚未涉及份额重新分配和份额公式调整等议题,而这些敏感问题的解决,国际舆论寄希望于下一轮份额的总检查。

事实上,距离2010年的份额调整,时间上已经过去了14年之久,其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力量格局也远非以前,按照现有IMF份额公式,目前IMF成员国的代表性存在被高估或低估的情况,其中,代表性被低估的成员国占成员国总数的41%,主要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具体说来至少25个成员国存在经济实力和在IMF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严重不匹配的问题。另一方面,虽然IMF几轮融资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票权总体上得到扩张,但随着增资扩股的实施,基本票权的占比却从最初的11.3%降到目前的5.5%,如此低微占比使表面上代表公平分配的基本票权在决策时几乎毫无意义;而最为重要的是,论整体票权,发达国家在IMF中占比依然要比新兴市场国家高出15.4个百分点,其中美国所拥有的投票权比重依然确保了它对最重大事务的“一票否决”权,同时美欧加起来的票权比重超过了30%,同样对重大事务可行使“一票否决”权。

尤其不得不面对的是,在IMF的治理结构中,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的掌控人,长期由美国公民或欧洲国家公民出任,而在少数发达国家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前提下,想要彻底颠覆美欧公民把持IMF头把交椅的

传统制度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屁股决定脑袋,IMF份额的调整要让部分发达国家割肉放血,仅在IMF决策层面就很难启动;另外,按照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埃德温·杜鲁门计算,即便是最应该提高份额的25个国家份额增幅只满足一半的目标,美国在IMF中的投票权占比将降至15%这个临界线附近,对此,美国绝对会行使“一票否决”权,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美好的改革也必然泡汤。

显然,IMF的份额变革不可能快速到位,也只能采取结构化的渐进方式。首先,作为影响份额票权的重要变量,GDP的测量可以由混合计算改为单独由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因此可以增加票权比重的5%左右,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其他变量得分展开增减调整,如降低开放度、国际储备的得分,新增成员国的收支失衡程度和人口因素,进一步适度增大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票比例,且上述结构性变化也并没有破坏发达国家的底线从而具有可行性。同样的温和改革方式也可运用在对IMF投票表决机制的简化层面,基本思路是,除了最重要事务需要全体一致通过外,其他重要事项统一采用70%有效多数通过,取消85%有效多数通过的表决方式,这看起来取消了“一票否决”权,但美国若持异议照样可以联合G7成员国行使30%以上的否决权;此外,所有要求70%多数票的决议都应采取双重投票制,即既需要投票权超过总投票权的70%,同时赞成票的国家数量要超过全体与会成员数量的60%,以真正实现成员国的主权平等。如此推动方式不仅让不同国家均有条件地获得否决权,更容易让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变革面前达成妥协并相向而行。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海外专利保护先行护航外贸“新三样”

刘诗梦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外贸“新三样”已成为产业发展新动力。外贸版图上,从过去服装、家具、家电这出口“老三样”到现在的出口“新三样”的变化,反映我国贸易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国产产品的科技含量与竞争力显著提升。

2024年3月5日,李强总理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指出,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近30%。据数据,2023年我国出口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

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29.9%。

随着“新三样”外贸出口总额的飞增,专利保护显得尤为重要。除了高质量生产之外,专利布局也在海外贸易市场上起关键性作用。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中国申请的动力电池专利占据了全球的74%,已成为驱动电机最大的生产国。

企业产品有出口,就有专利被侵害的风险,为提高企业竞争力,走得稳、走得远,就要在专利保护上下功夫。知识产权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我国强劲的海外出口贸易增

势下,保护专利避免在海外受到侵害的风险,就需要建立与完善专利在海外的布局。

根据中汽信科发布的《2023年中国汽车专利数据统计分析》,2023年我国动力电池系统专利公开量TOP20榜单上,宁德时代、中创新航、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占据18个席位。另外,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在1月发表一份调查报告表明,中国获得的专利数量在过去5年中翻倍,全球份额占比近40%,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专利保护先行对我国“新三样”出口贸易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开展海外专利布局保护,不

仅维护与稳固了市场地位,还能借此制衡竞争对手在行业内的不良扩张;第二,专利先行保护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核心不被破坏,提高“新三样”重点项目的商业价值,进而获取潜在利润;第三,专利先行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降低诉讼风险,并且同时获得更多的海外文化认同感。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司长张志成也表示,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刚需,是国际贸易的标配,中国政府始终一视同仁,同等保护国内外权利人的知识产权,致力于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构建一流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海外专利保护先行不仅保障了我国外贸“新三样”的出口,也为我国出海贸易奠定了强有力的法律基础。全球化背景下,制定海外专利也需要考虑企业自身因素,结合海外出口的市场特点,加强海外专利布局,推动创新产业的提质增效与放大出口优势。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开展海外专利布局的同时,也需要注意找准时机切入,从企业整体利益出发,协调好企业产品研究与海外应用的时机同步性,掌握好专利申请保护的时机,从而更好地为企业发展海外市场保驾护航。

(作者系证券时报版权管理专员)

在深圳东门老街看直播

孙勇

深圳的东门老街,突然又火了!这一次,它是贴着“网红直播一条街”的新标签火的。

东门老街上一次声名鹊起,是在40年前。彼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在市场经济快速升温、深圳与香港开启交流窗口的背景下,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中心地段、毗邻香港新界的东门老街,迅速成为万商云集、车水马龙的商业旺区。这里诞生了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中国内地第一家百丽、深圳第一家新华书店。在深圳告别边陲小城的新形象,昂首跻身于中国内地一线城市之后,东门老街更是人气爆棚,日均人流达50万人次,节假日更是高达百万人次,成为深圳乃至全国人流最密集的商业旺区之一。

最近10年,电商蓬勃兴起,在市场上攻城拔寨,受此影响,以实体店为主流模式的东门老街人气有所减少。三年疫情,对东门老街也造成了

不小的冲击。随着疫情结束,管控放开,东门老街很快恢复了活力,人声鼎沸的局面重新回归。嗅觉灵敏的主播们盯上了这个好地方。自2023年10月以来,全国各地的户外主播奔赴而来,很快让东门老街变成网红遐迩的“网红直播一条街”。

2024年元旦,我特地跑到东门老街看直播。当天的直播演出点不算多,但也有五六六个摊位。主播中,有俊男靓女,也有颜值一般者;有青少年,也有中壮年;有才艺出众者,也有才艺平庸者;有唱歌的,有玩乐器的,有表演脱口秀的,有跳舞的,有扮丑作怪的;有单兵作战的,也有团队合作的;有的直播设备齐全,几部手机和几个支架环绕,还有专业摄影师配合,有的直播只有一部手机和一个支架。有的演出摊位,围观群众多,手机拍个不停;有的摊位,围观者少,甚至无人问津。当然,美女主播最受欢迎。

主播们的演出摊位,设在步行街入口处的广场一带,对核心街区的人流不会造成阻滞。这应该是东门老

街管理人员对主播们做出的规定。这样一来,主播们的表演虽然热闹,却也井然有序。围观者先看看这个主播,再看看那个主播,移步换景,就当免费看一场民间表演的大杂烩,别有一番风味。有一位少年弹唱黄家驹的歌,模仿原唱颇有几分神似,吸引我驻足,我听得弹唱了约半个小时,顺手录了一个小视频,尽兴而归。

据自媒体“视觉志”的记者调查,户外主播们来自五湖四海,职业“走播”更是全国巡游,他们跟着热点跑,在一个地方播一阵子,然后再到下一个地方,像候鸟一般。很难说是主播们的到来带来了流量,还是东门自带话题,一位主播称东门为“天然巨大流量池”,高峰时期,每天大约有70组人同时开播。

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并不能给主播们带来实际收益,他们需靠PK和索要打赏、礼物获利。如果一名主播一晚收到价值100元的礼物,扣除平台50%的分成,剩下的50元会打到主播的个人账户。在抖音,音浪是

抖音直播的虚拟货币,10音浪可以提现1元,送出一个“嘉年华”,需要花费3000元。这就是主播们的主流盈利模式。当然,能否真正靠这个模式盈利,还要看主播们各自的造化。

网传,在东门老街,一位网红主播打PK,一晚上收上几百个“嘉年华”,一天收入高达几万元。还有更传奇的故事: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主播,在东门直播的成绩引起了上海某MCN公司的关注,成功签约,实现了阶层跨越。这类佳话在短视频平台上广为传播,它们往往带着某种标签出现,比如“东门四大天王”“东门某某某”之类的名号。充满激情的主播们为东门打出一个颇有感召力的旗号:“东门不大,创造神话”。

实际上,通过户外直播挣到大钱的,只是极少数人,这极少数人算是圈内“顶流”。处在中上流位置的直播,大约可以靠直播所得养活自己。绝大部分主播只是播了个寂寞,一无所获,如果算上设备与时间成本,甚至要倒贴。这是直播圈的基本生态,

东门老街的主播们自然也不会例外。

对于东门老街的直播热,有的人持欣赏态度,认为这是靠才艺和能力挣钱,光明正大,精神可嘉;有的人觉得无所谓,好比一阵风突然刮起,任它自生自灭就是;有的人则斥之为“牛鬼蛇神,群魔乱舞”,认为主播们都是一群好吃懒做的家伙,不务本,梦想赚快钱,败坏了社会风气。我本人持第一种观点。而且,我认为,一座城市的街头,如果充满草根气息的主播业繁荣,恰恰是这座城市有活力、有生动的表现。公众如果能投以欣赏的目光,尤其是,城市管理者如果能允许主播们自由生长,也体现了开放、包容的文明气度。对于民众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以此来审视东门老街直播,是应有的法律思维。

在我看来,拥有“网红直播一条街”这个称号和标签,对于东门老街而言,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大概率上,它会对东门老街的文旅事业产生加分效应。不妨拭目以待。(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